

王明蓀主編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十五編 第十七冊

元明之際江南的隱逸士人

汪栢年 著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十五編

王明蓀主編

第17冊

元明之際江南的隱逸士人

汪栢年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元明之際江南的隱逸士人／汪栢年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
木蘭文化出版社，2016〔民 105〕

目 2+168 面；19×26 公分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十五編；第 17 冊）

ISBN 978-986-404-614-0（精裝）

1. 士 2. 元代 3. 明代

618

105002223

ISBN-978-986-404-614-0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十五編 第十七冊

ISBN：978-986-404-614-0

元明之際江南的隱逸士人

作 者 汪栢年

主 編 王明蓀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 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6 年 3 月

全書字數 135270 字

定 價 十五編 23 冊（精裝）台幣 45,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元明之際江南的隱逸士人

汪栢年 著

作者簡介

汪栢年，出生於 1970 年代，喜歡閱讀及論文寫作。在研究生時代遇見啟蒙恩師林麗月老師，就鑽進了元明的時空之中，歷見士人群像。退伍後進入高中任教，自覺身兼元明之際士人般的文化重擔及恩師的教誨，不敢輕忽。倏乎已任教十五年，承先啟後的使命尚未完成。碩班畢業迄今已十七年，謹奉師命出版此論文，聊盡士人之微薄心力。

提 要

明初士人多不仕，是中國歷史上頗為奇特的現象，按常理推論，明以漢族王朝取代蒙元外族的統治，士人應踴躍出仕才是。結果不然，他們反以不仕為高，不理會明太祖求才若渴的心情，一意追求沒世無聞的隱逸生活。本文目的即在以江南地區為中心，探討元末、張士誠時期、明初的隱逸現象，分別由三方面考察：第一，從元明之際政治社會背景，看江南隱逸形成的外在環境；第二，分析元明鼎革之際江南隱逸士人的不同類型及其隱逸原因，以略窺此一時代隱士之心態；第三，探討江南隱逸士人的交遊與生活，及其對地方社會之影響。在章節安排上，除了第一章緒論及第五章結論外，第二章探討元末江南士人與政權的關係，分析元朝與張士誠政權底下江南士人的處境，以觀察元末以來的不仕風氣。第三章就筆者整理史籍所得的明初隱逸，分析其在元明之際不同的仕隱經歷，歸納為四種類型，並從明太祖與士人的緊張關係，觀察明初士人面臨鼎革之際的出處抉擇，以及明初隱逸士人的不仕原因。第四章探討元末明初士人之間的活動與營生方式，並觀察在元明之際政治、社會的急遽轉變，對士人群體造成的影響，以及隱逸在脫離了以仕宦為經世濟民的途徑之後，憑藉修身、齊家的淑世理想，致力於鄉里教化，在地方文教發展上所扮演的角色。



目

次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目的	1
第二節 相關研究回顧	9
第三節 研究範圍說明	15
第二章 元末江南士人與政權的關係	19
第一節 蒙元統治下江南士人的處境	19
第二節 江南士人與張士誠勢力的互動	36
第三節 元末江南士人的不仕之風	53
第三章 明初江南隱逸的類型及其不仕因素之 分析	59
第一節 鼎革之際仕與隱的抉擇	59
第二節 明初江南隱逸的幾種類型	75
第三節 明初江南隱逸原因之分析	85
第四章 隱逸與元末明初的江南社會	99
第一節 江南隱逸的交遊	99
第二節 江南隱逸的生活與貢獻	112
第五章 結 論	121
徵引書目	127
附 錄	137
附錄一 《吳中人物志》所見元代士人	139
附錄二 《明史·文苑傳》元明之際的士人	141
附錄三 史籍所見元明之際江南隱逸一覽表	147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目的

傳統中國，「隱士」有許多不同的稱呼，如高士、處士、逸士、幽人、高人、處人、逸民、遺民、隱者、隱君子等。近人蔣星煜引《舊唐書·隱逸傳序》：「堅迴隱士之車」認為這是「隱士」見於典籍的開始〔註1〕。其實不然，早在《荀子·正論》中即已有「天下無隱士，無遺善」〔註2〕之句出現。隱士的諸多名稱中，存在許多些微的差異：如處士與隱士這兩個指稱不仕者的名詞，就不一定能互相通用，處士所涵蓋的範圍比隱士廣，因為隱處不仕，不一定隱，而隱士則講究隱。〔註3〕以《韓非子》中記載的兩個春秋時代齊國的處士南郭處士與小臣稷為例，其實南郭先生是個濫竽充數、缺乏操守的士人。〔註4〕小臣稷卻與之相反，他鄙視爵祿，就連尊貴一時的齊桓公也不能輕易改變他的志向。這顯示了傳統中國隱士的地位甚高，齊桓公就曾對在野士

〔註1〕 蔣星煜，《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臺北：中華書局，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再版），頁1，〈中國隱士名稱的研究〉。

〔註2〕 楊倞注、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臺北：世界書局，民國七十二年四月），〈正論篇第十八〉，頁221。

〔註3〕 洪安全，〈兩漢儒士的仕隱態度與社會風氣〉，《孔孟學報》，第四十二期，民國七十年九月，頁117。

〔註4〕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見王先謙，《韓非子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民國六十三年四月，三版），卷五，〈內儲說上·倒言七右經〉，頁16a。

人給予極高的評價：「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註5〕可見操守才是「隱士」受到世人重視的關鍵；「處士」定義所指的士人中，亦不乏如小臣稷般輕爵祿以布衣自處、有志節的人，但也有濫竽充數、毫無才學的士人。小臣稷的操守，可以列為隱士而無疑問，南郭先生卻毫無才學、廉恥可言。因此，處士與隱士之間的分際，尚需考察傳主之生平事蹟，以瞭解其隱逸的真正理念。

人們通常把隱士解釋為「隱居不仕」的人，這種定義似過於籠統，試問：想入仕而無法入仕，以致閒居鄉野的士人，以及不想入仕而未入仕者，是不是都算隱士？謝寶富在〈隱士定義及古稱的考察〉中指出隱士的定義為：「看破仕途而不仕的、擁有一定學識才德的人」〔註6〕；Aat Vervoorn 探討中國隱逸的起源，亦認為中國的隱逸傳統，繫於道德因素，不像西方傳統中的隱逸，宗教犧牲的成分居多。〔註7〕因此，不是閒居鄉野之人皆可稱為隱士，唯有才德相稱之士，才有資格被視為隱士。戰國時代荀子認為隱處於鄉野之間的儒士，雖然貧無立錫之地，但是「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註8〕可見當時對隱士的推崇，不下於擁有權勢地位者，且真正被世人尊崇的隱士必定身懷才學，唯有如此，雖然居於陋野之中，亦不失其可敬之處，且為人主亟欲延攬為臣的對象。因此，隱士在中國的政治傳統中，成為一重要之流品；這些有資格入仕卻不願入仕的士人，歷史上一向有相當的地位與評價。

在推崇隱逸的傳統之下，史籍專門記載隱逸行蹟者甚多。如晉皇甫謐《高士傳》載晉以前九十六人，清高兆的《續高士傳》列晉至明一百四十三人，都是記載隱士之行跡。許多學者將「高士」的「高」，與《周易·蠱卦上九》之「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註9〕相類比，〔註10〕並將「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註5〕王先慎，《韓非子集解》，卷十五，〈難一〉，頁7b。

〔註6〕謝寶富，〈隱士定義及古稱的考察〉，《江漢論壇》，一九九七年第一期，頁53。

〔註7〕參見 Aat Vervoorn, "The Origins Of Chinese Eremitism,"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第十五卷，一九八四年，頁249~250。

〔註8〕楊倞注、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儒效篇第八〉，頁87。

〔註9〕王弼注、孔穎達撰，《周易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據清阮元刻本影印，民國四十四年），卷三，頁6b。

〔註10〕如朱子儀說：「『高士』是古人給予隱士的許多名稱中較常用的一個，取《易經》『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意思。」見朱子儀，〈魏晉《高士傳》與中國隱逸文化〉，《中國文化研究》，第十二期，一九九六年，頁72。

解釋為隱逸思想之起源。許多後世探討隱逸思想起源的論述，將隱逸思想的起源推向《周易》及其以前的年代，所根據的就是《周易》之「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一條。如高亨在《周易古經今注》中，繫於此爻辭下之註解即為：「此隱居不仕之意，古人筮仕若遇此爻，則勿仕可也。」〔註11〕劉紀曜將「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視為「不仕之隱」的表現，屬類於莊子政治思想之核心。〔註12〕然則，「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所代表的意義卻似乎與一般的隱逸不同，有其他的含義在內，不能等同於尋常的隱逸行為。明代焦竑在《焦氏筆乘》〈不事王侯〉條中提到：

蠱之五爻，皆言幹父之蠱，至上九則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後人往往引四皓、子陵解此一爻，誤矣。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不事王侯，此索隱行怪之所，為聖人不取也。《禮》曰：「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上九，處卦之終，當父母耄期之日，不出從政，非所以邀譽於鄉黨、朋友，非惡干祿而然，蓋知尊尚孝德者也。曾子居魯，齊欲聘以為卿。曾子曰：「居父母老，不忍遠親以為人役。」斯人也，其百世之師歟！故曰：「志可則也」。〔註13〕

則焦竑之意，否定「不事王侯」含有隱逸成分存在，他認為士人都應該出仕以盡「為士」的本分，除非如曾子般以孝為先，否則士大夫之行事，應該「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不從政是一種邀譽於鄉黨、朋友的行為，是聖人所不取的，隱含反對隱逸行為的看法。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探討「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內在動機，可以發現隱逸行為形成的因素，除了政治的動盪及輕視爵祿、重視操守外，孝養雙親也是一種促使士人「不事王侯」的原因。

明初士人多不仕，是中國歷史上頗為奇特的現象，按常理推論，明以漢族王朝取代蒙元外族的統治，士人應踴躍出仕才是。結果不然，他們反以不仕為高，不理會明太祖求才若渴的心情，一意追求沒世無聞的隱逸生活，這一歷史現象，後人曾試圖加以解釋，如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提到「明初

〔註11〕高亨，《周易古經今注》（臺北：開明書店，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初版），頁69。

〔註12〕劉紀曜，〈仕與隱～傳統中國政治文化的兩極〉，收入黃俊傑主編、劉岱總主編：《中國文化新論》思想篇（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七十年），頁306。

〔註13〕焦竑，《焦氏筆乘》（山東：山東友誼書社，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卷一，頁10b～11a，〈不事王侯〉。

文人多有不欲仕者」、「文人學士，一受官職，亦罕有善終者」〔註 14〕，認為明初士人多不仕與洪武朝士人多遭刑戮的現象有關。錢穆在〈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中從宋濂、劉基、高啓、蘇伯衡、貝瓊、胡翰、戴良等人的詩文加以申論，認為明初士人多不仕是當時時代風尚所致，且以明初士人心中多無夷夏大防觀念論之，〔註 15〕感慨那些明初士人只知忠於元室，在元亡之後，競以不仕為高。就民族大義而言，這些屢招不至、暫止而求去的明初士人，在錢穆眼中看來是「闇於時勢」、「昧於大義」〔註 16〕的。由趙翼對明初士人的評述可知，明太祖用重典治天下，是明初士人多不仕的重要原因；錢穆則認為士人在異族統治下，不知有民族大義的存在，在漢族復興之後的明初，仍然心向故元。

明初士人除了不欲為官，他們亦在詩文中流露對現況的不滿與對前朝的懷念。陳建華研究明初政治與吳中士人的詩歌顯示，明初吳中士人普遍對新朝不滿，表現出痛苦與壓抑的共同心理特徵，並於行動中展現對現實政治不妥協的態度。〔註 17〕勞延煊在〈元明之際詩中的評論〉中，對劉基、王逢、戴良、宋訥等人在元明之際不同時期的詩作中發現，即使是明朝佐命功臣的劉基，仕明後仍對元朝懷有深厚的情感，且明初士人普遍對張士誠的興亡始終耿耿於懷。〔註 18〕以上的研究成果顯示：第一，士人對元朝及張士誠治理下的生活滿懷回憶。第二，明初對吳中地區的治理方式，迥異於元末，使士人的生活產生重大的改變。因此，從歷史發展的脈絡來看，張士誠統治下的江南士人，歷經元朝、張士誠、明朝三個不同政權，對元朝與張士誠感到懷念，唯獨對明朝心存芥蒂。可見，江南士人在明朝開國前後的處境有很大的差異。

自南宋立國以來，江南地區無論在經濟、政治、文化上，比北方發展得

〔註 14〕 趙翼，《廿二史劄記》（臺北：仁愛書局，民國七十三年九月），卷三二，〈明初文人多不仕〉條，頁 741。

〔註 15〕 錢穆，〈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收入包遵彭主編：《明代政治》（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民國五十七年八月），頁 21。

〔註 16〕 錢穆，〈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續篇〉，收入《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六（臺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頁 192。

〔註 17〕 參見陳建華，〈明初政治與吳中詩歌的感傷情調〉，《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一九八九年第一期，頁 15。

〔註 18〕 參見勞延煊，〈元明之際詩中的評論〉，收入《陶希聖先生八秩榮慶論文集》（臺北：食貨出版社，民國六十八年），頁 145～148。

更爲迅速。南宋將國都定在臨安（今杭州），不僅將政治中心南移，更把全國的文化、經濟重心帶過了長江南岸。蒙元征服華北時之殺戮，使北方經濟的破壞加劇。但是，平定南宋卻採取招撫的政策，使江南得以在經濟、文化上持續南宋以來的繁榮。蕭啓慶認爲，此一政策影響所及，使元朝成爲江南人口優勢確立的時代，此一趨勢並持續到明朝。〔註 19〕在物庶民繁的情況下，元朝多賴江南財稅收入維持，「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眾，無不仰給於江南。自丞相伯顏獻海運之言，而江南之糧分爲春夏二運，蓋至于京師者一歲多至三百萬餘石。」〔註 20〕有趣的是，明太祖發給百官的俸祿，同樣是取自江南官田。〔註 21〕因此，明初的江南社會歷經兩種不同型態的統治，卻相同地付出經濟上的成果以維持國家運作。

另一方面，在位者的政治措施對南、北士人的影響也很明顯，蕭啓慶的研究顯示，江南儒戶數當在十萬零六百四十七戶左右，北方漢地儒戶約爲一萬四千戶，江南儒戶數遠勝過北方。〔註 22〕元代儒戶可以優免差役、減少賦役，使業儒之士能夠有別於一般編戶。因此，元朝對儒士的態度，並不像後世想像般那麼鄙視，無疑地，儒戶在元代地方社會佔有一定的地位。雖然讀書並不是儒戶所獨享的特權，但是南方儒戶數在數量上遠超過北方的事實，可見元朝仍然維持南宋以來的狀態，江南地區依然爲士人眾多之地。達第斯（John W. Dardess）研究元朝儒家與儒學在元朝地位的發展及與統治者的關係，認爲在至正元年（1341）脫脫主政後，儒學成爲支配元朝的最高政治理念，儒家文化受重視的程度，與主政者的態度有很大的關係，〔註 23〕但並未對儒士地位的變化及元朝儒化的程度提出進一步的討論。〔註 24〕蕭啓慶認

〔註 19〕蕭啓慶，〈蒙元統治對中國歷史發展影響的省思〉，《第二屆國際邊疆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民國八十五年五月），頁 9。

〔註 20〕《元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明洪武刊本，百納本二十四史，民國七十七年一月，臺六版），卷九三，〈食貨志一〉，頁 2364。

〔註 21〕「百官之俸，自洪武初，定丞相、御史大夫以下歲祿數，刻石官署，取給於江南官田。」見張廷玉，《明史》（臺北：洪氏出版社，民國六十四年十一月，初版），卷八二，〈食貨志六〉，頁 2002。

〔註 22〕參見蕭啓慶，〈元代的儒戶：儒戶地位演進史上的一章〉，收入氏著，《元代史新探》（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七十二年六月），頁 16。

〔註 23〕John W. Dardess, *Conquerors and Confucians-Aspects of Political Change in Late Yuan China*, (臺北：虹橋書局，民國六十三年二月)，p.163.

〔註 24〕胡其德，〈評達第斯「征服者與儒家——中國元末政治變遷」〉，《師大歷史學報》，第五期，民國六十六年四月，頁 6。

爲，由於元代君主兼具蒙古大汗與中原帝王的雙重性格，統一後蒙元政權的性格與典型漢族王朝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元廷在政策上不能全盤採用漢法，更無法全面提倡漢化。〔註 25〕

就江南的政治地位而論，由於元朝將契丹、女真族劃歸爲「漢人」，與原屬於南宋臣民的「南人」，政治、文化立場截然不同。〔註 26〕元朝統治者對漢人、南人也有不同的看法，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曾派程鉅夫往江南訪求賢才，《元史》記其事曰：

詔以爲參知政事，鉅夫固辭。又命爲御史中丞，臺臣言：「鉅夫南人，且年少。」帝大怒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臺院，必參用南人。」遂以鉅夫仍爲集賢直學士，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奉詔求賢於江南。初，書詔令皆用蒙古字，及是，帝特命以漢字書之。〔註 27〕

從元世祖任命程鉅夫爲御史臺臣時所受到的輿論壓力，可知江南人民政治地位的低下。雖然元世祖執意要提高江南士民的政治地位，就歷史事實而論，終元之世，南人仍然無法在政治的舞臺上展露身手。元軍於至元十三年（1276）攻佔南宋都城臨安，獲取江南廣大的土地與人民。至元十五年（1278）六月「詔汰江南冗官」，八月「追毀宋故官所受告身」〔註 28〕，這些行政措施使南宋降官紛紛罷職。北方漢人歷經契丹、女真統治時間甚長，在金元鼎革之際，士大夫與地方豪強紛紛投靠蒙古，獲得較南人爲高的政治地位。〔註 29〕南人原被列爲民族等級的最下等，又受到元廷官員及北方漢人的歧視，政治參與機會降低很多。即使是江南的地方官，也是任用漢人，南人只能擔任下級官吏或胥吏，在政治上被刻意地疏遠。〔註 30〕元朝在統治江南十餘年後，蒙古

〔註 25〕 參見蕭啓慶，〈元朝的統一與統合——以漢地、江南爲中心〉，收入《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八十四年），頁 194。

〔註 26〕 「金元取中國後，俱有漢人、南人之目。金則以先取遼地人爲漢人，繼取宋河南、山東人爲南人。元則以先取金地人爲漢人，繼取南宋人爲南人。」見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八，〈金元俱有漢人南人之名〉條，頁 630。

〔註 27〕 《元史》，卷一七二，〈程鉅夫傳〉，頁 4016。

〔註 28〕 《元史》，卷十，〈世祖本紀七〉，頁 203。

〔註 29〕 參見蕭啓慶，〈元朝的族群政策與族群關係〉，收入《族群融合三千年》（臺北：歷史月刊社，民國八十五年三月），頁 113。

〔註 30〕 參見檀上寬，〈義門鄭氏と元末の社會〉，《東洋學報》，第六十三卷四期，一九八二年，頁 92～93。

官員仍然對南人充滿了歧視，雖然元世祖忽必烈採取懷柔南方的政策：遣程鉅夫求賢於江南、江南求賢詔以漢字書寫等措施，但是元代的江南人民政治地位始終沒有提高。這種不平衡的差別對待，在當時人心中已有深刻感觸，江南有一首民謠唱道：「寒自江南暖，飢自江南飽，物物是江南，不道江南好。」〔註 31〕可以看出江南人民對自己政治地位的低下已經心存不滿。

元代士人雖然在出仕機會及政治上的地位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失去了傳統優越的身份。但是，元朝入主中國之後，基於統治上的需要，對士人仍有許多禮遇，士人在元代的地位並不如以往認為是低落的，且元代的學校教育呈現多元性發展的面貌，地方教育並未因蒙元統治而中衰。〔註 32〕于金生透過對元代地方學官的經濟狀況與政治活動的分析，評價他們在元代的社會地位。認為絕大多數的學官都是屬於儒戶，享有法定的經濟權利和義務；在政治上，與政府官員保有較密切的關係。〔註 33〕雖然學官不能代表士人全體，至少可以確定士人出身的學官在元代社會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由於治理方式的不同，元明兩朝的社會風俗也有絕大的差異，明初方孝孺對元朝以來的社會習俗作了一番考察，他認為：

元以功利誘天下，眾歡趨之，而習於浮誇。負才氣者以豪放為通尚，富侈者驕逸自縱，而宋之舊俗微矣。大明御宇內今三十年，屢詔誥四方，鏟削元之遺弊，吾意士俗當復如宋時之美乎。〔註 34〕

宋、元、明三代的社會風俗並不相類，可以從方孝孺這句話中得到一絲佐證；由於元代對於經濟管制的寬鬆，社會上充滿了逐利競奢的豪侈之風，甚至到了洪武開國後，明太祖有鑑於元亡之速，檢討其原因，認為：「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註 35〕「明祖懲元季縱弛，特用重典馭下，稍有

〔註 31〕孔齊，《至正直記》，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 87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七十四年），卷三，頁 31a，〈曼碩題雁〉。

〔註 32〕蕭啟慶，〈五年來海峽兩岸元史研究的回顧（一九九二～一九九六）〉，（國史館主辦：中華民國史專題第四屆討論會——民國以來的史料與史學，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頁 20。

〔註 33〕參見于金生，〈元代的地方學官及其社會地位〉，《內蒙古社會科學》，一九九三年第三期，頁 83～86。

〔註 34〕方孝孺（1357～1402），《遜志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八年，臺一版），卷十四，頁 42a～b，〈贈盧信道序〉。

〔註 35〕劉基，《誠意伯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七年十二月），卷一，〈皇帝手書〉，頁 3。

觸犯，刀鋸隨之。」〔註 36〕可見這項移風易俗工程之艱鉅，益可見元末社會之習尚迥異於明初洪武改革後之儉樸社會。在嚴密的律法控制之下，明太祖統治下的明初江南社會與元末的寬鬆不可同日而語，相較於元明鼎革時的動盪，明初社會由奢侈轉入樸實，更是不容忽視的重大轉變。鄭克晟認為，江南的地主與士人，在元代由於政策寬鬆，勢力不斷擴大；明代則不斷迫害，橫遭打擊，江南社會的情況為之一變。〔註 37〕

綜上所論，江南地區經濟富庶，為人口密集之地，卻缺乏出仕的門徑，導致江南士大夫大多埋身於鄉校，或隱遁山林。〔註 38〕因此，在元代江南地區就有隱逸的風氣，這與明初士人多不仕的現象，似應有所關聯。朱元璋曾對士人多不仕的現象深有感觸：

前元待士甚優，而權豪勢要，每納奔競之人，夤緣阿附，輒竊仕祿；其懷材抱道者，恥與並進，甘隱山林而不出。風俗之弊，一至於此。

〔註 39〕

這段文字是明太祖於洪武三年（1370）八月，開設科舉時詔告天下的內容。明太祖自己也承認元朝對待士子甚為優渥，當時士人可以優游林泉而無憂，「甘隱山林而不出」儼然蔚成一股風氣，甚至成為「風俗之弊」了。時代風氣的形成是經歷長期醞釀而來的，從時間的承續來看，明初的隱逸風氣是從元朝廷續而來的，因此，探討明初不仕現象，自不宜將元末士人的隱逸風氣略而不論。〔註 40〕

從元明之際士人的詩文集來看，彼等對明朝的觀感實有超乎我們的想像者。如王逢，江陰（常州府江陰縣）人，曾為張士誠謀劃策略，藉降元取得元朝的正式任命以對抗朱元璋。〔註 41〕他對蘇州城被陷、元朝大都覆亡等事件，

〔註 36〕 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三二，〈明祖晚年去嚴刑〉條，頁 744。

〔註 37〕 鄭克晟，《明代政爭探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二月），頁 1。

〔註 38〕 蕭啟慶，〈元朝的族群政策與族群關係〉，頁 126。

〔註 39〕 《明史》，卷七十，〈選舉志二〉，頁 1695。

〔註 40〕 錢穆在〈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中曾指出：「元雖不貴士，然其時為士者之物業生活，則超出編戶齊氓甚遠，此當縱論及於元代之社會情況及其經濟背景，非本文範圍所及。」見錢穆，〈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頁 49。可見並未將元代待士的傳統與地區性的社會經濟活動列入考慮，只從明初士人詩文集來論列此一現象。

〔註 41〕 「張氏據吳，大府交辟，堅臥不就。」、「原吉為張氏畫策，使降元以拒臺，故其遊崑山懷舊傷今之詩，于張楚公之亡，有餘恫焉。」見錢謙益，《列朝詩

在詩文中表達了無限的激昂慨歎，在得悉徐達攻克平江、俘虜張士誠之後，他寫下〈聞吳門消息二首〉，其中有「三年弟傲群情懈，十月城圍百戰休；海島何人歌爲挽，華容有女淚空流。唇亡遂使諸蕃蹙，板蕩將遺上國憂。」〔註42〕之句，其時已在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距離朱元璋即帝位僅三個多月，在王逢的詩句中並無朱元璋即將一統天下的喜悅與期盼。王逢於元明兩朝皆不仕，然而心懷故元，《明史》稱：「元亡後，惟（戴）良與王逢不忘故主，每形於歌詩。」〔註43〕這「不忘故主」的心結，與趙甌北歸結「明初文人多不仕」的原因爲「明太祖用重典治天下」，實有一段距離；而錢賓四所說的「昧於大義」、「無夷夏之防」，亦似乎無法確切地解釋當時士人的想法。

本文目的即在以江南地區爲中心，探討元末、張士誠時期、明初的隱逸現象，分別由三方面考察：第一，從元明之際政治社會背景，看江南隱逸形成的外在環境；第二，分析元明鼎革之際江南隱逸士人的不同類型及其隱逸原因，以略窺此一時代隱士之心態；第三，探討江南隱逸士人的交遊與生活，及其對地方社會之影響。希望本文能稍補前人研究之不足，並於明初江南士人社會之瞭解有所增益。

第二節 相關研究回顧

《史記·伯夷列傳》載，殷周之際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註44〕伯夷、叔齊認爲武王伐紂是一「以暴易暴」的不義行爲，爲了堅持自己的理念，不恥與周室共天下；其隱逸觀的根源，直接與政治理

集小傳》（臺北：明文書局，民國八十年），甲前集，〈席帽山王逢〉，頁54。《文淵閣四庫全書》〈梧溪集提要〉亦稱：「張氏據吳，東南之士咸爲之用，逢獨高蹈遠引。」見王逢，《梧溪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28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五年七月，初版），頁1a。《明史》載：「張士誠據吳，其弟士德用逢策，北降於元以拒明。」見《明史》，卷二八五，〈王逢傳〉，頁7313。可見王逢心向元朝，希望張士誠爲元室效力，並藉以對抗朱元璋，他雖獻策於張士德，卻志不在出仕。

〔註42〕此詩之前二句爲：「承制除封八鉅州，士恬馬飽正逢秋。」在王逢的眼中，張士誠爲元朝的屏藩，此兩句顯示吳地之地闊物阜，張士誠卻毫無備戰姿態，流露出王逢的腕扼之情。見王逢，前揭書，卷四，頁90b~91a，〈聞吳門消息二首〉。

〔註43〕《明史》，卷二八五，〈戴良傳〉，頁7312。

〔註44〕司馬遷，《史記》（臺北：鼎文書局，民國六十六年十月），卷六一，〈伯夷列傳〉，頁2123。

念相聯結。究竟隱逸觀之形成，與政治局勢變動之間，是否有一定程度的關聯呢？王仁祥檢視《詩經》中有關西周晚期到春秋中期的記載，〔註 45〕認為隱逸的出現，基本上有兩個條件：一、必須存在一群受過教育，具有相當知識水平與道德修養，並有入仕資格的人。二、其所處的時代動盪衰微，或個人的處境艱困不安。〔註 46〕小林昇在他的〈朝隱の説について隱逸思想の一問題〉中認為戰國時期的混亂造成政治局勢的動盪不安，是士人隱居在野不願出仕的一個重要因素。〔註 47〕這種視外在政治環境以決定出處的隱逸，較接近孔子「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註 48〕的「時隱」觀念。

其實，政治因素只是促成隱逸的原因之一，有些人並不以天下治亂為決定出處的標準，歷史上最顯著的就是道家的隱逸，尤以莊子全身避世的思想為代表。劉紀曜認為：「『出仕』根本就違反莊子的思想與原則，現實政治裡的君臣關係，在莊子眼中根本就是桎梏天性之物。」〔註 49〕則莊子的人生哲學是「反仕」的，主張沒世無聞、與世隔絕的避世思想；孔子在他的旅途中所遇到的一些隱士，如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蓀丈人等，都是屬於莊子道家性的隱士。

洪安全研究兩漢的隱逸，提出「儒道混合性的隱士」的說法，指出有些士人不肯出仕，過著道家式的隱居生活，仍不忘儒者本業，〔註 50〕符合漢朝以後儒道融合的趨勢。王仁祥研究兩漢的隱逸則指出，忠於舊政權而不仕新政權者，於王莽篡漢之時表現最為突出。其後光武中興，表彰氣節，這些亂世中的隱者遂為當世所崇敬，其事著之於史，又成為後世仿效的典範。自此之後，每當改朝換代之際，必有不仕新朝的隱逸，成為國史上的常態。〔註 51〕

〔註 45〕在《詩經》的一些篇章中，可以發現貴族在不安的政治局勢及沈重的工作壓力下，沉吟出不如歸去的哀歎。如〈考槃〉，為賢人退隱，自詠其樂之詩；《陳風》〈衡門〉，為賢者甘貧而無求於外之詩。另如《小雅》的〈鶴鳴〉、〈白駒〉兩篇，都是隱逸自詠其心境的詩歌。參見王仁祥，《先秦兩漢的隱逸》（臺北：臺大出版委員會出版，臺大文學院發行，民國八十四年），頁 34。

〔註 46〕王仁祥，前揭書，頁 43。

〔註 47〕小林昇，〈朝隱の説について隱逸思想の一問題〉，《中國・日本における歴史觀と隱逸思想》（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一九八五年），頁 253。

〔註 48〕《論語》（臺北：藝文印書館，據清阮元刻本影印，民國四十四年），〈泰伯第八〉，頁 5a。

〔註 49〕劉紀曜，前揭文，頁 309。

〔註 50〕洪安全，前揭文，頁 139。

〔註 51〕王仁祥，前揭書，頁 174。

朝代易鼎之際，士人直接面臨仕與隱的抉擇，尤其是在宋元、元明、明清之際，由於外族入主中國，士人的出處抉擇，動機甚為複雜。周全曾將宋遺民依其事蹟分成四類：一是奮赴國難者，如文天祥；二是入元不仕，杜門著述，教授生徒，以薪傳民族大義，保文存種者，如王應麟。三是遁逃海外，圖謀匡復者，如祖元。四是嘯聚山林者，如周密、方鳳、鄭思肖等；其中以隱居山林者最多。他研究林景熙、唐珏的生涯事蹟指出，兩人於宋朝皆未出仕，入元後仍以宋遺民的身份自居，受到忠節及夷夏觀念影響甚大。〔註 52〕周全並研究宋遺民的詩作，發現他們詩中充滿感傷國事、自悼身世、詠史明志等特色，〔註 53〕透露出遺民傷國憂民的悲憤心情。王次澄研究元初宋遺民組成的月泉吟社的詩作，認為遺民詩社除了讓他們紓解亡國之痛與故宋懷思外，另具有以詩會友與滿足科舉的嚮往，除此之外，詩社亦提供豐厚的給賞，滿足遺民現實生活上的需要。〔註 54〕

關於元代士人的研究，蕭啟慶認為元代士人，尤其是江南士人，在出仕的時候面臨兩大困難：第一、元朝用人取才最重家世，即當時所謂「根腳」。元朝中期以前，一直未恢復科舉制度，漢族士人遂喪失此一主要的入仕管道。第二、元朝實行種族階級待遇制度，且元廷對南人極為猜忌，北方漢人對南人甚為歧視。〔註 55〕這是從制度面上來討論元代士人，尤其是江南士人出仕的困難。王明蓀的研究指出：「元代用人取士頗受苛評，多以為表面雖崇儒，實則刻薄限制；科舉及各種選法，意在牢籠而不予士人正當出路。」〔註 56〕在這仕途無望的局勢下，元代士人的出處就跟其他時代有很大的不同。他並從元人的筆記中整理了七點元人不仕而隱的情形：一、以為自己出仕的條件或能力不足。二、以朝廷之政風及需要不合意者。三、以欽慕古隱逸之士者。四、以道不行、時不用而隱者。五、屬於類似人生觀的不仕者。六、忠於故

〔註 52〕周全，〈宋遺民林景熙與唐珏〉，《臺北師專學報》，第十二期，民國七十四年六月，頁 55。

〔註 53〕周全，〈宋遺民詩試論〉，《臺北師院學報》，第一期，民國七十七年六月，頁 432~434。

〔註 54〕王次澄，〈元初遺民詩人的桃花源——月泉吟社及其詩〉，《河北學刊》，一九九五年第六期，頁 67~68。

〔註 55〕蕭啟慶，〈宋元之際的遺民與貳臣〉，《歷史月刊》，第九十九期，一九九六年四月，頁 57。

〔註 56〕王明蓀，《元代的士人與政治》（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民國八十一年），頁 92。